

少年書呆子牢獄之歌

蔡焜霖

出生與童年

故鄉清水，舊名「牛罵頭」，由於小鎮東方鰲峰山麓有靈泉，滾滾湧出之水足夠全鎮數萬人口飲用，遂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改名「清水街」，隸屬臺中州大甲郡。一九三〇年底十二月，我出生在俗稱「旗竿內」蔡家，在六個兄弟中排行第四，如加上四個姊姊就排行第八，算是家中比較幼小的孩子又是體弱多病，因而童年時期備受寵愛，從來不知道世間有何辛酸困苦。一九三五年墩仔腳大地震，老家三合院大宅第整棟倒毀，父親在原來建地上重建了寬敞的平房住屋，我在那兒居住到十九歲被捕為止。震災後，父親繼續在清水最熱鬧的「十八崁仔」街區開設「梅芳百貨店」，生意鼎盛，看來一切復興過程就緒，不料那年農曆除夕夜，十八崁仔鬧區發生大火災整個店被熊熊火焰吞沒。連續遭受地震和火災等災禍，父親卻不輕易屈服，

經他辛苦奮鬥，家道不墜反旺，他經營的百貨店很快再成為清水最大、生意最興隆的一家。

求學經過——啓蒙和小學教育

一九三六年進入清水幼稚園，每天都由家中女傭人揹著去上學，遭到幼稚園助理小姐羞羞臉，之後被揹到快抵達幼稚園的地方趕緊吵著要下來，裝著啥無介事地走進校門。在幼稚園認識一個小我兩歲的小妹妹，他是幼稚園盧老師的女兒。有一次我陪著她經由老師禁止小朋友走的縱貫路，一路撿著製糖公司運送甘蔗的檯車掉下來的甘蔗回家，結果第二天被盧老師怒目叱責，幼小心裡覺得委屈又傷心。次年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進清水公學校一年級就讀，從此開始學習日語的「假名」、「平假名」，逐漸學會了讀日文的書。三哥蔡焜燦大我三歲，自小很照顧我這個體弱又生性內向的小弟，除了常帶我四處去玩耍之外，也帶我到清水街頗具規模的圖書館看書。幼小的我被圖書館這座寶山深深吸引，從此放學後或假日常常一個人跑去那兒借書看。可能因愛看書的緣故，日文的寫作能力日益進步，但是近視眼的毛病也在不知不覺間更加嚴重。而慧眼發覺我「寫作能力」和「近視眼」的正是小學五、六年級擔任我們級任導師的楊明發老師。他每次上課發覺我常常眯著眼睛看黑板，甚至於乾脆站起身來凝望黑板上的字，知道我視力有問題，有一

次家庭訪問時告訴我家長應該帶孩子去檢查。有了楊老師的叮嚀，我生平第一副眼鏡就這樣在臺中鼎鼎有名的「宮原眼科」檢查和配好。

楊明發老師擔任我們這一班的級任導師後，驚覺全班學生的學習力太差，將來報考中等學校，要和來自臺中州（包括光復後的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全州國民小學的優秀學生競爭實在不敢樂觀，於是決心趁小學最後的兩年嚴格教學，要大幅加強我們的升學競爭力。而我們這班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一直當「級長」的正是楊老師的大兒子。於是嚴格的管教就從特別嚴厲對待自己兒子開始。在體罰被認為「愛的教育」



蔡焜霖（前排右二）的國小畢業照中就已戴眼鏡。（蔡焜霖提供）

的一種手段的時代，老師對一向成績領先全班的級長兒子，動不動就拳腳相加，或以「愛的鞭子」揮打，令全班同學從此不敢偷懶怠惰，家庭作業就是量多又很困難也一定做好才敢來上學，課堂上也都聚精會神聽老師講解，使得全班學習力在很短時間裡突飛猛進。這樣嚴厲的老師居然對我另眼看待，就是他發現我日文作文能力比較強，除了批改作文簿時給我高分及鼓勵的話外，在大甲郡全郡老師的觀摩教學的場合，也以我寫的作文為範例，叫我站起來朗誦自己寫的文章再加予講評指導。原先我在班上的成績雖然還排在前面幾個但並不特別顯眼，直到楊明發老師到任之後才開始嶄露頭角，老師又提拔我為副級長，寒暑假還叫我們到他家免費補習，使得我們這一班後來升學考試獲得學校創校以來空前的好成績。

求學經過——中學時期正遇時代巨變

小學畢業之後經過激烈的升學考試競爭，一九四三年十二歲那年終於和包括級長（楊老師長子）在內的本校另七位同學一齊考取了夢寐以求的臺中第一中學。臺中一中是日治時期臺灣的仕紳林獻堂、辜顯榮、蔡蓮舫等為提升為臺灣人的教育水準而捐款籌設的學校，報考的學生來自臺灣全土，清水公學校（那時已改名為清水南國民學校）一舉有八名學生金榜題名，實為破天荒的壯舉。

可惜，考上和就讀「名校」的喜悅和興奮只維繫了大約一年吧，中學二年級以後，能在教室讀書的好時光變得微乎其微，大部分的時間被派去軍用機場割草，或被派去軍營挖土、搬石頭，幫忙加強防禦工事。有很多同學還因長期勞累，又被傳染了瘧疾而紛紛病倒。到了三年級，只要不是長期臥病起不來的，那怕像我這樣的「瘦排骨」，通通算是體格「甲等」，被徵用去當「學徒兵」，佈防在海線一帶。後來調防在臺中水湳的軍用機場。

一九四五年八月炎熱的夏天，我們臺中一中三年級「學徒兵」，駐紮在現在的臺中機場，說是要訓練成機關砲兵，以對付盟軍轟炸機日益激烈的空中攻擊。其實這時的日本皇軍已經是強弩之末，我們這群十四、五歲的娃娃兵所駐紮的機場建築，差不多都被炸毀，只好在沒有屋頂的斷垣殘壁上搭起帳篷住宿。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為防備盟軍登陸臺灣，曾把原先布置在滿州（中國東北）最精銳的「關東軍」南調於臺灣和沖繩群島前線。但是這一批號稱日本最慍悍善戰的正規軍是配置在臺灣島內陸的後方，倒是把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娃娃兵配置在海岸第一線以及機場等最危險的地方，存心把臺灣小孩當砲灰先去抵擋盟軍登陸部隊的鋒穎，其陰險殘忍，現在回想起來，真令人毛骨悚然。

就在八月中旬一個烈陽當空的日子，獲知日皇已經無條件投降！打從六歲進小學後多年來被灌輸的「皇民思想」和「日本神國」永不會被擊敗的神話，在一夜之間煙消霧散。負責帶

領我們的少壯軍官死不認輸，晚上幾杯老酒下肚就高喊著要死守臺灣，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聽得我們這些迷夢初醒而歸心似箭的小男孩，兀自過著忐忑不安的生活。還好拖了個把月後，終算讓我們退伍把我們放回學校。

國籍改變、在時代的變遷中徬徨

「復員」回學校後真的改朝換代，一切都變了。日本老師被遣回，穿著黑色中山裝的中國校長帶著一批老師來接收，也有許多學有專長的年輕臺灣老師加了進來。學制也從日治時期的五年中學（戰時末期曾縮短為四年），「光復」後改成各三年的初中和高中。一九四六年，初中畢業那年的暑假，我與高一屆的學長和同年級同學一共十個人，被選派到淡水中學去參加為期一個半月的「臺灣省第一屆青年夏令營」集訓。行政長官陳儀親自兼營主任，而副主任則有柯遠芬、李友邦等人。結訓時全體學員每人都強迫加入國民黨，或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暑假過後回到學校，雖然我們幾個來不及參加高中的升學考試，卻特別獲准免試直升，我被編入高一丁班，且被推選為班長。我們這一班固然大部分都是中學一年級以來的老同學，卻也有不少從別的學校考進來的所謂「轉學生」。級任導師是擔任英文教學的林炳生老師，講起英文雖有濃重的腔調，卻是一位年輕熱情的好老師，記得也是投筆從戎、參加青年軍而復員歸來

後，單身來臺教書的。高一下學期發生二二八事件。父親設法庇護為人忠厚的外省籍警察分局副局長一家人。當清鄉部隊進城，又趕緊送我到山上親戚家藏匿，等到局勢比較安定後才回學校繼續學業。升高二、高三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國共內戰的情勢一日數變。而家庭生計也一日不如一日。我三哥當時在彰化高商擔任教職，雖然薪資單薄，卻一直鼓勵我高中畢業後要念大學，於是升高三後，出錢讓我住進學校宿舍（那時叫學寮），好專心準備功課。

但是每次還鄉，看見白髮蒼蒼的老父親，在和平時期曾是鎮上數一數二的大富商，一到光復後百業凋蔽、物價飛漲的時代卻一籌莫展，被十幾口大家庭的重擔壓得瘦弱不堪，半夜裡撞見他垂下頭面色凝重地跪在神壇前上香禱告，我怎麼樣也下不了決心報考大學，最後還是死了這條心。高中畢業後我最想做的是去當國民小學的老師。我一向喜歡天真無邪的小孩，而且從小崇拜瑞士十八世紀教育家裴斯塔洛齊，希望向他看齊畢生無私奉獻給教育事業。況且我夢寐暗戀的「楊璧如」，在讀完女中後也為幫忙家計，經過縣裡檢定第一名，以那瘦小的身子在家鄉小學教書。她爸爸（我小學恩師）楊明發先生在光復初期即榮任大臺中縣的縣政府督學，卻在二二八事件時被人密告為漢奸而接受調查中，整整兩年沒有薪水拿，只得靠這小女孩來養家餬口。我想，高中畢業後我也要去教書，如果能朝夕和熱戀的人相處，也有機會向她傾洩長年隱藏心中的愛，那麼放棄升學也不可惜。有了這樣的念頭後，我再也無心於學校的

功課，常到臺中一中圖書室（有很豐富的日文藏書）去借來一本又一本厚厚的文學或哲學書籍，囫圇吞棗地濫讀一通。當時級任並教我們代數的王老師大概以為「孺子可教」吧，就推薦我去參加學校幾位熱心的年輕老師組織的「讀書會」。猶記得第一次集會，指導老師要每個人從近來所讀的書中舉出一本印象最深的，並提出讀書報告。我向老師說我要寫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學者 Thomas Carlyle 所著《英雄和英雄崇拜》心得報告，老師竟然睜大眼睛露出蠻訝異的眼色。那時出自一個十七歲多愁善感的青年對動盪混亂的社會的不滿，我似懂非懂地嚮往著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深受光復後才接觸的魯迅、巴金等作家的影響，追求著烏托邦虛無飄渺的理想。現在想來，那畢竟只是慘綠少年浪漫的憧憬罷了。由於心理上這樣的徬徨搖擺，我連在教室裡上課的時候，也都在私自翻閱課外圖書，或胡亂寫著宣洩情緒的詩文。

畢業典禮當天拿到了文憑，又參加了謝師晚宴後，我和翁啟林和王箴芳兩位同學跑到學校旁邊的臺中市立運動場去，躺在運動場斜坡的草地上，三個人喝完了一瓶紅酒，另加一瓶汽水，聊了通宵達旦。不知為什麼，總覺得一切都很悲哀，又很孤單……。

突來的風暴

畢業後在當年經濟凋蔽的環境下找工作很不容易。經過一個多月的挫折等待和尋找後才在家鄉鎮公所謀得辦事員一職。後來也考上了小學教師的檢定考試，一方面在鎮公所上班，另一方面尋覓小學教師的空缺。九月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我拖著木屐到鎮公所去，獨自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辦公室加班，突然撞進來一個便衣的憲兵（後來才知道他身份），先把我帶去警察分局關起來。我有個小學很要好的同學在警察分局當差，看到這情形後火速跑去我家告訴家人。我二哥馬上趕來，又保證又講情地苦苦哀求卻也奈何不得。最後雙手被綁了起來，搭公車送往彰化的憲兵隊。從警察分局到公車站一直被便衣憲兵像一隻狗一樣拖著走，鎮上的人，只敢遠遠地旁觀著，心裡一定猜不透這個平常在鎮公所待人還誠懇忠厚的年輕人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搭公車的時候，瞥見我三哥混在別的乘客中上車，彼此都不敢招呼一聲，只好假裝沒看見。當車子駛過母校的小學、而且也是意中人當老師的學校門口時，心想這一離去大概永遠再也見不到她了吧，有一首老歌浮上心頭，心裡默默哼唱：

今別れてはいつか見む	今日離別何日再相見
幾歲春が巡るとも	不論春去秋來多少歲

橄欖の花 く丘に 橄欖花盛開の山岡上
再び語らんことやある 可有重敘離情的一天

被押在彰化憲兵隊期間，遭到軟硬兼施的偵訊。又刑求（毆打和電擊）又哄騙（年少無知只要坦白招認很快可以回家），這時才知道原來讀高二時加入讀書會就是我被捕的理由。關了幾天後，雙手又被綁了起來，搭乘擁擠不堪的火車被送往臺南憲兵隊。這次押送，被細繩綁得緊緊，手腕的繩痕在往後好幾個月都久久消除不掉。臺南憲兵隊牢房門口掛著「匪諜案」的門牌。同一批從彰化被押送來關在一起的，有臺中農學院（現中興大學）畢業的陳明忠以及臺中師範學校畢業的黃介石及尤來榮。我們這幾個乳臭未乾的年輕小伙子，完全猜不透前面還有什麼樣的命運等待著我們，只得在恐懼和不安中煎熬著。

再下來的日子裡，移送臺北的保安司令部，接著又是保密局、軍法處、新店看守所等在幾處監獄中輾轉移送。那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剛發飆之際，臺灣全島風聲鶴唳到處抓人。原有的監獄不夠用，就把日人遺留下來的臺北東本願寺、戲院、甚至於學校都改造成臨時監獄。儘管如此還是不敷用，每處的監獄都爆滿，我們都像沙丁魚罐頭的魚一般被擠壓在一起，即使換兩班睡覺，都還要身子疊著身子屈膝而睡，伸腿根本是個乞求不到的奢侈。狹窄的牢房內擠那麼多人又是終日不見天日，混濁燠熱的空氣沈澱著，整天光著身子只穿著一件短褲的難友們，只好在牢房中間吊起一大塊毛毯，結上繩子大家輪流搖，

讓空氣不斷的流動。才剛高中畢業的我算是難友中的小老弟，離鄉背井落在這種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雖然萬分的沮喪，幸賴同房中的前輩都是思想和政治案件被捕的，不但人生閱歷豐富，大多都是人格修養高潔的人士，對我們年輕小弟百般的關愛，讓我這樣沒見過世面的文弱書生，也勉強熬過了人生最痛苦的坐牢時間，還從前輩難友身上學得了很多真實的學問。初進軍法處時常常聽到大家合唱一首歌——「母親的呼喚」。後來我也學會了就跟著同房難友在狹窄的押房裡兜著圈唱著。其實遼河在大陸什麼地方也不是很清楚，只一心一意想念著故鄉的老母。

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呀。

那樣的沉痛，那樣的悠長。

馱載著，千萬個母親的哀傷！

母親的心中像被烏雲遮蔽，

母親的眼睛被淚水洗盪，

孩子們呀，孩子們呀，母親在念著你呀，

孩子們呀，孩子們呀，母親在呼喚你。

像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呀，那樣的沉痛，那樣悠長。

軍法處（現臺北喜來登飯店）的凌晨四、五點是恐怖的時刻。沈睡的寂靜中響起獄卒的腳步聲和打開鐵門的咿軋之聲，每位難友夢中驚醒，在關著幾千人的大牢內大家摒氣靜息，靜聽著獄卒一一唸起被判死刑將被押出去執行槍決的名單。被叫

到名字的牢裡前輩，常是從容起身換上早備好的雪白襯衫或乾淨衣服，與牢友一一握手後走出去被五花大綁送往刑場。這時留下來的人唱著安息歌送行。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指引我們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基隆高中鍾浩東校長被叫到名，他預先請求牢友替他合唱年輕談戀愛時喜歡和女友唱過的「幌馬車之歌」為他送行。

夕べに遠く 木の葉散る 並木の道を ほろぼろと
君が幌馬車 見送りし 去年（こぞ）の別れが とこし
えよ

黃昏遠處 落葉飄飄 行道樹的馬路上 離情依依
目送著載你的馬車遠去 去年的分離變成永恆…

十一月有一天清晨，從我被關的斜對面押房走出一個稚氣未脫的少年，他走到每一個押房雙手抓著牢房的粗木柵格，雖然鐵青著臉卻強自振作向留下來的人一一道謝這段期間的照顧後才走出鐵門。看他那樣子既在感念牢裡前輩的愛護，但也好像期待著有人能拉住他不讓他那麼小小年紀就被抓出去打死。

但是沒有人能夠拉住他的手不放，也沒有人救得了這個剛剛變聲，才開始要變大人的小孩。後來才知他的名字叫劉嘉憲，六天前剛在牢裡度過他十八歲的生日。事隔數十年，至今我仍無法忘懷那位稚氣未脫的孩子，雖然因緊張而鐵青著臉，卻拼命振作精神，立正站在我們面前，隔著牢房柵門向大家道謝和告別後被拉出去的情景。他們到了牢房外，聽說都被五花大綁，用囚車送到馬場町（現青年公園）執行槍決。每遇執行死刑的日子，消息很快傳遍偌大的監牢，從女囚牢房傳出聖母頌，而男囚牢房傳出合唱安魂歌幽怨的歌聲。後來在冬日某一天，我聽到了臺中一中的老同學彭沐興兄也遭槍決的噩耗。

一九五〇年底我在軍法處迎接二十歲生日。生日禮物竟然就是「參加非法組織與散發傳單」罪名處予十年徒刑（最輕的刑期！）的判決。且在翌年初從青島東路軍法處移押至新店由戲院改成的看守所。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老父由大姊夫陪著從中部小鎮專程來探訪被囚禁的兒子。當年的交通情況很差，年邁父親一定受夠了遠途跋涉之苦。但是他心目中最膽小軟弱的小孩居然犯「叛亂」大罪而被判重刑！父親心中的痛苦該是遠超過他肉體上的疲憊困頓的吧。我更沒有想到這次的見面變成永遠的別離。

火燒島十年

父親來看我不久，我們被移送內湖國小集結，過了一陣子兩個人手銬著手，由基隆港被催趕上海軍登陸艇送往惡名昭彰的火燒島。我們被送去的地方，官方美其名謂「新生訓導處」，就在那兒度過了九年又四個月接受洗腦教育和上山下海做苦工的歲月。上政治課做筆記或參加小組討論準備發言稿，我這個小老弟盡量幫忙農村糊裡糊塗被抓進來的老前輩，或是替他們寫信（每週只限三百字一封信，而且要檢查）。而上山砍草、搬運木頭，或是灼熱的海邊揮動著大鐵鎚打咕啞石等重勞動，就由大我們幾歲的「同學」已經在社會上各行各業做過事的，幫助我們、替我們這些文弱書生多擔當，在這裡也跟在監獄的時候一般，「政治犯」都充分發揮了在苦難中互助合作的人性善良的一面。

島上遇到不少臺中一中的學長和同學，但不屬於同一個中隊的即使白天放出來勞動的時候碰了面也嚴禁交談。只有一次遇到教代數的王漢章老師拿著掃把打掃院子，看我從他身邊走過去，小聲叮嚀：「自己多保重身體，無論如何要忍耐、要堅強的活下去。」此後我多想找機會走過同一個地點，盼望還能碰見他，可惜始終未能如願，後來就聽說他已經被送回軍人監獄。



蔡焜霖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時的新生照
(蔡焜霖提供)

在漫長的坐牢歲月裡，依靠三哥和五弟寄錢、寄東西接濟我。我並不知道當時家庭生計如何，只是猜著應該不會怎麼寬裕。有一次向同學借到一本余光中翻譯的《梵谷傳》，讀到梵谷小弟（記得叫做西奧吧）一輩子百般幫助他那位瘋瘋癲癲的哥哥。想起自己弟弟因我被捕而輟學，小小年紀負起家庭生計又要接濟我。幼弱身軀曾經在冷冽的東北風中兜售醬油，令我對著《梵谷傳》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

由於高中畢業不久就因高二時期讀書會案子被抓進監牢，周圍又多的是差不多同樣遭遇的年輕人，因而在我自己的心海中，臺中一中的六年多加上被囚禁的十年時常混淆起來，構成好長好長的「求學時代」。火燒島做苦工的日子，在山上割草或海邊砌石頭，我常對著分隔自己和故鄉老家的蔚藍大海，高唱義大利歌謠「歸來吧！」或“*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想著家人也想著我這輩子可能已無緣再見到的意中人。等待晚點名之前的時間在營舍前廣場散步，仰望天空有一輪明月高掛，一曲「思鄉曲」格外令人想念母親。青春就這樣在汗水和失去自由的痛苦中慢慢消蝕，不敢奢望終有走出牢籠和家人重逢的一天。

歸來吧！蘇連多 Tona A Surriento

聽那海洋的呼吸 充滿了柔情蜜意
你的笑語和歌聲 留在我的心底
園內陽光明媚無比 菊花到處放出香氣

對著這麼美的風光 叫我怎麼不想你
自從你和我別離 悲哀湧進我的心裡
在這可愛的地方 數著你的歸期
歸來吧 歸來 請不要把我忘記
歸來吧 歸來 我在等你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I'll have you to remember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Your love will live in my heart
So, kiss me my sweet
And so let us part
And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
That kiss will live in my heart

思鄉曲

月兒高掛在天上 光明照耀四方
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裡 記起了我的故鄉

故鄉遠隔至重洋 旦夕不能相忘
那兒有我高年的苦命娘 盼望著遊子還鄉

愛讀書、愛唱歌而被槍決的朋友

當時監管「新生訓導處」的警總有個「殺雞儆猴」的辦法，隨時挑了些較不聽管訓或他們心目中較具影響力的囚犯遣回本島的監獄以莫須有的罪名重判，甚至於判刑槍決。我和第三中隊同隊中年齡相仿的幾個同學比較處得來。其中一位小我一歲的蔡炳紅，十八歲臺南師範畢業奉派在臺南市公園小學當老師，沒有幾個月就被抓來判了五年徒刑。他長得英俊帥氣、做事又認真負責，不僅難友喜歡、連監管囚犯的官長都無不喜歡他。有一天早上新生訓導處突然下達緊急集合令，叫我們全體新生把自己全部行李搬出來在操場列隊排好，接受官長的搜查。另一批官長就進去寢室裡搜遍每一個牆角和柱子床板裂縫，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突擊檢查。那天下午我們照常勞動，蔡炳紅和我一起用一根長棍在「流麻溝」旁邊抬石頭以供修補提防。到了下午五點多收工的時候，綽號「三太」的陳分隊長走來叫炳紅等一會兒回到隊上向他報到。由於這位分隊長平常相當喜歡蔡炳紅，所以當時我絲毫沒有警覺到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但是炳紅當夜去報到就被關進山岡上的碉堡，整夜未回害得我輾轉失眠。第二天消息傳來，我的好友寫了小字條塞給他臺南同鄉就讀臺南女中時被抓來的女生，鼓勵她要勇敢要忍耐。結果突擊檢查從女生行李搜出這張字條，蔡炳紅才被關進碉堡。聽說被關進碉堡的人，一天只給一碗飯和一碗水，吃喝拉屎睡覺

都在那窄小的空間。那天下午上山砍草回來，我跑去福利社買了一些炳紅平常愛吃的糖果餅乾，偷偷走近山岡上的碉堡，看準碉堡屋頂荷槍實彈的衛兵正在眺望遠處操場進行中的籃球比賽，我快速閃進碉堡屋簷下，從窗口把糖果餅乾倒了給他。但只看到炳紅和另外兩個被關的同學，個個上身打赤膊只穿一條短褲汗流浹背，開口說「水、要水！」。這時我才對自己的愚笨和小孩子氣心生痛憤和後悔，怎麼沒有想到好友陷入困境後真正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以後的幾天想辦法給朋友送去他所急需的水，但還沒能夠送水之前，好友炳紅和幾位同學被送回臺北軍法處重審。幾經一年後新生訓導處第二任處長集合了全體新生，語帶恐嚇宣布先前被送回軍法處重審的難友全部被槍決結束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蔡焜霖在綠島人權園區教師體驗營講述學弟蔡炳紅槍決的故事。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提供)

等到過了半世紀後，臺灣的民主進程有了大步進展，白色恐怖相關檔案相繼解密，我輾轉拿到所謂「綠島叛亂案」的卷宗。豁然發現好友蔡炳紅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判決中是被判「原來刑期執行完畢後再加感訓三年」。但這樣的判決後來呈上國防部，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加注了意見，送到總統府，總統府秘書長和參軍長又加注了意見，無不要求更嚴厲的刑罰，最後呈上總統，總統批了四個字：「嚴予複審」，還要追究軍法官原先「輕判」的責任以及新生訓導處的管理責任，這就決定了我好友等十一位年輕人的命運。最後複審判決下來，同案十一個年輕人全部被判死刑，其中還包括臺中一中高我一屆的楊俊隆學長、以及新竹女中十七歲就被抓來的高中女生，個個都是愛好文學、愛好藝術，在學校都是獲得師長特別青睞的學生。做為這些年輕人犯罪證據而被沒收的是：匪書《社會進化史》筆記三冊、匪書《青年的修養》上下兩冊、以及字條數件。判決書在列舉他們犯罪事實，有一條說「被告在新生訓導處管訓期間常在散步時唱匪歌『歌唱祖國』以鼓勵叛亂情緒」，而這首從南日島戰俘學來的歌我也和炳紅一起在山上和在海濱唱過。最令我震撼的是好友他們十一個人，在執行槍決之前拍攝的照片都面露笑容——這對於生性膽小懦弱的我，變成永遠無法理解的謎。

重獲自由

一九六〇年九月坐滿整整十年的監牢後終被釋放，搭著漁船到臺東，轉乘巴士行經九彎十八拐的山路到了高雄，再改乘夜班火車「歸心似箭」地一路趕「回」臺北縣的三重。因為根據五弟的來信，他結婚後因工作的關係購了新屋移居那兒，且年邁父母也和他住在一起。



從綠島歸來的蔡焜霖
(蔡焜霖提供)

第二天清晨車到臺北，下車後從後車站走出來，手裡拿著寫有地址門牌的小字條和地圖，一路上向人問路好不容易找到重慶北路的大姊家。叫了門剛好有個中學生打扮的女孩子背著書包來開門，應該是我外甥女正好要去上學的吧，但是有了十年的隔閡彼此不很認識，當然也不敢亂打招呼，只好講好來意，逕自上樓去找大姊。大姊馬上換好了衣服就帶著我，門前叫了一部三輪車走過臺北大橋駛往三重。自由的空氣是如此的甜美，而早晨的街景所見猶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都是無比的新鮮。尤其想到很快就能見到隔別十年的父母親和兄弟們，心裡說不出的興奮。到得了五弟家，大姊還在付三輪車車費，我就急忙跳下了車推開大門，興奮的喊著「爸爸媽媽、我回來了」，也喊著五弟和六弟的名字。兩個弟弟馬上衝了出來，而母親也老淚縱橫地走了出來，卻是久久不見父親的動靜。大家互道久別重

逢的喜悅後，大姊和弟弟們反都很不尋常地沉默不語。我以為父親可能是患了感冒或什麼還睡著的吧，就私自推開幾個臥室的門喊著「爸爸」探頭去尋找，卻都不見他的縱影。久久，么弟再也忍不住，脫口說：「爸爸已經過世了」，然後又一段沉默後：「就在你被送往火燒島次一年他老人家自己了斷了生命」。

我大腦裡「哄」的一聲，就像遭人從腦後狠狠地重擊了一般，眼前一片昏黑，就倒在地上翻滾著哀嚎痛哭。只記得好像有人把我從地上撐了起來，我還繼續對著牆壁或對著柱子不停地撞頭也不停地哭著。如今我活著回來又有什麼意義呢。早知道，還不如就在那惡魔島跟隨著父親跳海死掉！我一直哭號著，哭累了就像喪失了靈魂的殭屍一般，木然坐在地板上發愣久久、久久……。

父親啊，父親！

我父親是一位標準的嚴父，一向不苟言笑，卻是心裡隱藏著無比的慈愛。當年考上臺中一中要到學校去報到，是大哥帶我從鄉下坐火車去的。當大哥和矮小的我並肩走在通往故鄉火車站的砂石路上時，父親騎著腳踏車從後頭追過來，拿著一包裝著當時算是很難買到手的「仁丹」以及家庭常備藥品，還有零用錢（其實他幾天前就先給過我的）等等塞我手裡，也一再地叮嚀：生平第一次遠離家門到外地去住，一定要多多注意健康、保重身體。

一九三五年中部地區大地震那一天，我們全家只留著母親和當時才出生沒有多久的五弟在家，其他人一大清早就上山去掃墓。來到祖母墓前擺好了祭品、也點好了香，突然間大地搖動，還附帶著嗡嗡然的聲音，眼見山坡下的池水泛著令人恐怖的血紅色搖盪。父親強壯有力的雙手抱緊了最幼小的我，防我滾落山谷。

父親年輕時雖在日本統治下卻一心嚮往祖國，曾離家出走渡海到廈門想要參加抗日的行列。但是他事母極孝，後來被老母硬是找回來，一個大漢子竟跪在老母面前任她老人家用藤鞭抽打得皮破血流。他的儒學涵養很深，也寫得一手好字。我初入小學時的書包、用具上面，他都用工整的毛筆字替我寫好了名字，終究我一生，自己的名字沒有一次寫得那麼的秀麗和令人喜歡。聽說父親晚上做惡夢都會唸著文天祥的正氣歌來鼓舞自己的精神。

也因為這樣的個性，臺灣「光復」當初「國軍」開入小鎮，父親興奮得顧不得穿好鞋子，抓起青天白日的小國旗就打著赤腳衝到街道邊揮舞旗子歡迎。甚至於從大陸福建操著小帆船開進梧棲港、穿著破爛棉襖的老鄉，父親也把他們視同祖國過來的鄉親，常常請回家款待他們，殷殷打聽祖籍鄉園的近情！

二二八的大災難發生，父親因同胞兄弟相殘而憂心重重。他老人家聽說平常為人正直忠厚的警察分局副局長全家人處境危殆，就叫我二哥冒險把他們一家人接回家供吃供穿加予保護，

直到不幸事件緩和下來才送他們安全回家。副局長夫妻從此拜我父母為義父、義母，讓我們兄弟平添多了位「阿山兄」和「阿山嫂」。在那段社會到處充滿著肅殺氣氛的時期，鎮壓軍開進



一九六二年蔡焜霖與楊璧如的結婚照片（蔡焜霖提供）

城來，父親趕緊把正在念高一的我送去山上親戚家躲藏了一陣子……。

然而父親所熱愛的祖國，最後還是抓走了他幾個兒子中最懦弱的、一個只會死讀書而且依賴心最重的小孩，並莫名其妙地判了他十年的重刑。這個小孩在剛剛「光復」時，學著日本小說《母親》中的少年主角，也到處去尋找祖國「救國英雄蔣中正」的畫像……。

出獄後求學與求職屢次遇到挫折

出獄後照規定馬上到臺中縣警察局去報到，後來在家鄉找不到能餬口的工作，只好遷來三重投靠五弟。應徵飯店的服務生、當過漫畫出版社的翻譯、在小報社當編輯等等換了好幾道工作，而每次警察都如影隨形地來抽查生活工作情形讓我深覺所謂出獄，只不過從一所範圍較小的監獄移調到較大的監獄而已。對我們這種一旦被貼上「匪諜」標籤的人，真正的自由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歷經許許多多的波折，後來終能和青梅竹馬的「意中人」結婚。我暗戀多年的「她」長年以來一邊當老師、一邊繼續升學進修。結婚後勸我再回學校繼續唸書。剛好在從前的「師範學校」改制升格為「師專」第一期招生的時候，我僥倖考上。高高興興去註冊報到，我把坐十年政治冤獄的事老老實實向訓

導處報告，訓導主任聽罷大驚失色，叫我先不要和別的老學一起住進宿舍，他就趕緊寫了公文書分別向警備總部和教育部請示可不可以讓我就讀。同一個時間考進去的師專同學全部住校，只有我一個人很特別的差不多有一個月時間吧，每天都從家裡來上學，直到有一天訓導主任叫我去當面告訴我，警備總部因我獄中的成績是「甲等」，又為了「安定」出獄人的生活，很贊成讓我乖乖在學校唸書；但是教育部卻認為「師專」是培養國民教育師資的搖籃，不容許被判過十年重刑的「匪諜」前科者入學。訓導主任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我只得匆匆辦了退學，第二年為了滿足長年來想用原文閱讀左拉、莫伯桑、雨果、以及波多雷爾等大師作品的願望，以第一志願考上了淡江文理學院夜間部的西洋文學系法文組。我這三十歲的「歐吉桑」學生，由於自己興趣所在，仍能以班上第二名的成績贏得了獎學金。不過有了臺北師專的教訓後，我不管求學、求職都盡量的隱姓埋名，更不敢讓人知道自己「匪諜前科」的底細。

在求職方面，我曾經看報紙去應徵新開幕飯店的服務生，強調我會英語會話。但可能已年屆三十，人家嫌我當服務生太老而未被錄取。後來報考位於重慶南路的金融《徵信新聞》，是金融銀行界的專業報紙。考過中日文翻譯的筆試後獲得錄用。我把匪諜前科坐牢十年的事情照實以告，就在那兒工作數月。但將近年底時，該社社長涉及與人訴訟案，管理部門認為有我這種前科的人對報社會有不利影響，遂在新年將至的時節把我開除。之後應徵考入赤峰街的寶石出版社，是當時一家最大的



蔡焜霖夫婦抱周歲的兒子（蔡焜霖提供）

漫畫出版社。我擔任日文翻譯成中文的工作，薪資以件計酬，收入不甚穩定。工作一陣子後，經我小學恩師、那時已成為我岳父的楊明發老師，請託他日治時期臺北師範學校的老同學介紹，轉任東方少年月刊社擔任編輯。當年「東方少年」與「學友」並稱兩大兒童雜誌，極受小讀者歡迎。可惜好景不長，這兩大雜誌遭受新興的漫畫週刊及漫畫大王等的競爭壓力，後來被迫停刊而轉換成專門出版漫畫的文昌出版社。我繼續任編輯，但工作態度及能力受到老闆廖文木先生的肯定，凡是編輯、排版、印刷、裝訂以及行銷等業務都讓我參與，在老闆和我兩人合作無間的努力下，公司業績蒸蒸日上，文昌出版社很快發展成為漫畫界的龍頭。

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出獄人的浮沉

國華廣告幸遇生命中的貴人許炳棠先生

那段日子白天在文昌出版社工作，夜晚就讀淡江文理學院。在一九六三年某一日在報紙上看到國華廣告公司徵人消息。在當年臺灣經濟正要起飛的關鍵時刻，我很想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去不同的業務領域尋求發展，便把履歷表以及中日文的自傳寄去應徵。歷經書面審查以及筆試等層層關卡的篩選，留到最後面試的階段。主持面試的是總經理許炳棠先生以及當時國華唯一的經理林溪瀨先生。面試進行一段時間後，許總經理說：「你筆試以及自傳的日文都寫得很好，可是面試時一句日語都沒說，是否只會讀和寫而不會講日語？」，我答以「總經理不用日語問我，當然就沒有機會用日語回答。」於是許總經理開始用非常流利的日語發問，我也都能對答如流。後來總經理說：「你自傳裡說喜愛日本文學，可否背一首日本詩人的詩給我聽？」他這麼一問正中我下懷，因為當時我才結婚不久，追求女友期間寄情書抄寫過不少日本詩人的詩，於是當場找一首簡短的西條八十的詩〈嘆きたまいそ〉背誦了起來。

許總經理聽我背誦完，忙誇獎之餘說：「你背誦得很好，那麼我也背一首回敬你」，於是高聲朗誦了日本文豪島崎藤村的名詩〈初戀〉。

許總經理用充滿感情的聲調背完了足足比我長兩倍多的長詩，就當場告訴我明天就可以來上班。然而文昌出版社的廖老闆器重我很深，一直要留我。使得真正到國華報到當 Copywriter 是整整三個月以後的事。在國華上班還不到一個月時，有一天許總經理叫我下班後留下來和他一起加班，他要把公司規章訂定得更加完整，希望我能把他口述的條文一一寫下來。於是那一天大多數同事都下班後，我陪著許總在總經理室，夾著偌大的辦公桌面對面坐下來，總經理講一句我就寫一句，這樣忙了大約一小時多。總經理說我們休息一下喝個茶吧，我把茶杯拿起端到嘴邊時，許總突然冒出一句話：「今天警察來找你。」聽到這句話，我把茶端到嘴邊的手忽然開始發抖，想著「這下完了，明天又要和這家公司說掰掰了。」許總看到我這樣子，以和藹的語氣說：「放心好了，我已經跟警察說你在我們公司很認真工作，我會替你擔保，以後不用再來找你麻煩。」一聽了這句話我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心想有這樣的老闆，我這輩子一定要死心塌地為他效勞，報答他的恩情。那一夜完成了工作等我向總經理道晚安告辭的時候，總經理輕輕說道：「我內弟（夫人弟弟）也因案被槍決」——語氣中充滿著很深很深的哀傷和心疼之情。

那一年我在國華廣告努力扮演廣告撰文員的角色，更盡力去學習和充實市場行銷和廣告方面的新知。當時臺灣的經濟發展正處於起飛階段，較大規模的廣告客戶大多數都是日商，或是臺日合作的企業。在這種環境下，我的中日文能力就較有發

揮的空間，也因此受到許總經理以及客戶的欣賞肯定。於是進公司第二年總經理就提拔我當新設立的「專戶室」主任，專門為當年公司最大的客戶「臺灣松下電器公司」提供廣告服務。那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我日以繼夜想把工作做好，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常常還要麻煩許總經理跟我一起到客戶公司挨日籍主管的批評指責。

《王子》雜誌的榮耀與破滅

到了一九六六年，政府早年公布的「連環圖畫輔導辦法」付諸實施，也就是說從此出版漫畫書，必須事先送請國立編譯館審查才可以印製發行。這麼一來屬於中小企業型態的漫畫出版社不堪資金的積壓及成本的增加而紛紛倒閉和關門。我從前服務的文昌出版社也撐不下去，傳出準備結束營業的消息。許多往年同事七、八個人一起到國華廣告來找我，要求為他們找出一條生路。我先介紹其中一兩位考進國華，但公司無法收容所有的人。經過大家多次商量，曾經考慮過創設一家製作動畫影片的公司，但當年臺灣只有臺視一家電視台，覺得 Animation 動畫還沒有成熟的市場只好作罷，後來才考慮創辦兒童雜誌，最後拍版定案把雜誌名稱訂為《王子》半月刊，一個月發行兩次。只是創立一家雜誌社需要資金和負責經營的人，大家叫我一定要實質參與才行，拗不過以往同事的請求，我只好硬著頭

皮去向許總經理請辭，最後還動員妻子到總經理陽明山上的住所去懇求才獲得首肯。第二天早上許總經理讓我們夫妻倆搭他專車下山時，很誠懇地跟我說現在辦兒童雜誌為時太早，如果再慢五年，他願意參與投資讓我去充分發揮。然而當年文昌的同事大家都失業了，我無法再等五年啊。許總還要我承諾，有一天要離開雜誌社就一定要回來國華廣告服務。在許多過去獄中難友出獄後謀職困難的當年環境中，許總經理這番好意令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生命中最早一位貴人，也就是小學恩師楊明發先生，那時已經是我的岳父。他畢生獻身教育界，對我創辦兒童讀物持肯定的態度。我懇請他參與投資並且擔任我們雜誌社發行人和社長。《王子》一創刊，由於當時兒童讀物極度缺乏，《王子》的編輯和印製都求盡善盡美，使得發行量屢創新高，公司業績



蔡焜霖在《王子》雜誌編輯部的工作身影。

（蔡焜霖提供）

也蒸蒸日上。在這中間，往年綠島的難友陸續釋放回來，找不到工作的我盡量設法請來雜誌社幫忙。先後到王子來一起奮鬥的，共有張景川、吳澍培、周子良、陳孟和、陳東光等多位同學，使得王子雜誌社一時變成三重警察局的眼中釘，隨時來盤問，也常在夜間來臨檢。這種時候，在三重國小當老師而且很受校長和家長敬重的我妻子，每次都扮演我的擋箭牌。有了她，很多難題都獲得化解。



蔡焜霖在《王子》雜誌舉辦全國兒童畫展時的照片
(蔡焜霖提供)

《王子》除了辦雜誌以外還舉辦了「全國兒童畫比賽」、「國際兒童晚會」、「老師與讀者家長座談會」、「國際兒童畫作品全臺巡迴展」等等多彩多姿的各種活動。一九六八年夏天還協助臺東縣紅葉國小棒球隊來臺北參加全國少棒賽而勇奪冠軍，接著在迎接日本隊來臺進行友誼賽時捐贈球衣球具給紅葉隊，終能對我國少棒進軍世界做了棉薄貢獻。只是我個人年少被關了十年，覺得人生起點比同儕慢了很多，焦急之餘一心要急衝快衝，一直擴大事業範圍，《王子》之外還創辦《幼年》及《公主》雜誌，並且自設印刷廠和裝訂廠，從企劃、編輯一直到排版、印刷和裝訂都一手包辦，導致原先就不是很健全的財務體質變得更加脆弱，而在一九六九年中秋節前後兩次颱風來襲，設在三重市的雜誌社和印刷廠及裝訂廠全部被淹沒，我負債二百四十萬，《王子》雜誌終告倒閉。為了不辜負數千長期訂戶小讀者，設法安排接手人後黯然離開了苦心創辦和奮鬥三年多的《王子》雜誌。

隱身國泰關係企業十七年

當年中小企業要爭取銀行融資非常困難，資助我而被我倒債的都是好心幫忙我的親朋好友，包括破例為我銀行貸款做連帶保證人的國華廣告許董事長以及大洋廣告楊基忻董事長（我妻子的堂叔）。公司倒閉，我愧對這些支持我最多卻被我牽累

的親友，夫妻倆心灰意冷之餘，抱著剛出生未滿周歲的嬰兒遠走臺灣尾，一度想跳海葬身於巴士海峽的蔚藍滄海中。但不忍無辜小生命陪死，遂先跑去遠嫁屏東縣潮州的二姊家託孤，卻被二姊和姊夫看出破綻，一天二十四小時緊盯著我們並不斷好言規勸。後來在她們的鼓勵下才重回臺北，由當時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當經理的外甥王政雄介紹，報考該公司當年甫創設的「淡水教育中心」，擔任保險教育教材編譯及講師的工作。那是我出獄後工作最輕鬆愉快的日子，每天搭公司交通車準時上下班。但是我因揹著一身債又牽累很多人而愧對親友，搭車或路上行走頭都低低的不敢抬頭見人。王政雄趁翌年赴日研修之



蔡焜霖在綠島人權園區教師體驗營解說「王子雜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提供)

便，成功邀請日本的保險大王原一平先生來臺訪問，在國泰人壽全臺各地巡迴演講。我受外甥之託全程陪同擔任現場翻譯，使得聲名大噪，連國泰機構創辦人蔡萬春董事長都認識了我。原一平先生訪問結束後，有一天基隆警察局派人到國泰人壽淡水教育中心來，因《王子》倒閉時跳票連連，我觸犯了票據法而被逮捕，經由基隆警察局再送到臺北地檢處看守所。正在等候被移送到龜山入監之前，蔡萬春董事長伸出援手，支付二十萬元罰款把我保出來，以後就由我每個月薪水無息扣還。

蔡萬春董事長看重我國華廣告公司的經歷，把我從國泰人壽「淡水教育中心」，改調他的三男蔡辰洋總經理創設的國泰建業廣告公司，由業務部副理，再調升開發部經理。工作一年後調回國泰人壽公司，擔任蔡辰男副董事長的秘書。辰男副董事長嗜好讀書並喜愛蒐集中西書畫作品。我在他囑咐下籌設國泰美術館並任首任館長。館藏本來以明末以降的中國書畫為主，卻也在留學西班牙名畫家林惺嶽先生斡旋下與藝術家雜誌社合辦「二十世紀西班牙畫展」而轟動一時。蔡辰男先生後來接任國泰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並吩咐我於一九七九年籌設百科文化事業公司，由張詩經先生就任總經理，派我任總編輯。一年後公司規模精簡，張總經理離職，從此公司經營全盤責任落在我身上。前後出版了「二十一世紀世界彩色百科全書」、「學生音樂百科」等書，到一九八三年更創刊以年輕女性為對象的《儂儂雜誌》。然而當百科文化業績蒸蒸日上，正要更進一步朝著編製一部能代表我國的百科全書之路邁進之時，於

一九八五年二月爆發了「十信 / 國信事件」，包括百科文化在內多達四十多家的國泰信託關係企業都遭遇前所未有的風暴，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事件的源由應該從一九八二年蔡萬春董事長次子蔡辰洲先生被延攬加入國民黨並當選立法委員講起。他當選之後亟想有所作為而結合劉松藩、王金平、洪玉欽等所謂本土派委員在國會組成「十三兄弟」派系積極問政。或許這樣的作為觸犯執政當局的禁忌，在「江南事件」喧囂於社會的那個時期，金融監督管理單位強行檢查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業務，導致該合作社與蔡辰州的長兄蔡辰男所主持的國泰信託投資公司遭嚴重擠兌的情形。結果國泰信託投資公司由交通銀行接管，關係企業紛紛遭受清理整頓的命運。四十多家關係企業的總經理、副總經理等高級主管，全因為所屬公司做連帶保證的關係，銀行戶頭及房屋被查封，紛紛趕往法院辦理夫妻財產分別制以求「亡羊補牢」自力救濟。作為百科文化公司的經營負責人，我先讓創刊不久的儂儂雜誌社與百科文化公司分離而獨立。然後加強公司財務體質繼續奮鬥了兩年，再向蔡辰男董事長報告，有秩序地結束了公司的業務。時隔十七年後的二〇〇二年八月，我晚年生活所賴的銀行存款數百萬遭到法院查扣，差一點全數被沒收，後經貴人協助才獲得歸還。

經濟全球化潮流中重返國華廣告

結束百科文化公司業務之後，我還保有「儂儂雜誌社」董事長一職。就在這時候，往年恩人國華廣告公司許炳棠董事長三度約我懇談，希望我能遵守早年承諾回去國華協助他。許董事長已經中風臥病多年，雖然以無比毅力做復健，使健康情況改善不少，卻也年歲漸高，亟需旁邊有個得力助手幫忙他進行經營改革，以求在全球化經濟潮流中力求公司的永續經營。

一九八七年返回國華廣告服務之時，日本電通、美商奧美、英商智威湯遜等世界前十大廣告公司全都進軍臺灣投資發展，使得國華、聯廣、臺灣廣告、東方廣告等本土廣告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在董事長充分授權下，進行公司經營透明化、加強上下左右的溝通、激勵員工士氣、推動事業部制度、加強員工教育訓練等，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國華廣告蛻變成一家以創意及行銷服務獲得客戶信賴的廣告公司。尤其著眼於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我由總經理晉升副董事長任內，促成世界最大廣告公司日本電通、以及與本公司早有淵源的中國時報社合資入股，奠定了公司永續經營穩定的基礎。

回顧自己一生，由於生性懦弱怕事，反而惹引更多的是非事端。也因此牽累以及陷害了好多最愛護我的親友。如果我沒有那麼軟弱，父親也不會因我憂憤而死。《王子》雜誌遭遇財務危機之時，如果我能勇敢面對、果斷處理，那麼應該也不會

牽累眾多提供資金和支援給我的親友。然而，再多的如果、再多的懺悔現在都太遲了、無法彌補我往日的過失。現在只能向我眾多恩人默默獻上心中最深的感激與最虔誠的祝福。

作者簡介

蔡焜霖，一九三〇年生於臺中清水，就讀清水公學校，後考入臺中一中，保送高中部，擔任班長，老師叫他參加讀書會。高中畢業後，進入鎮公所任事務員。一九五〇年的某一天，特務突然到家中將他逮捕，因為高中讀書會的同學曾散發「共匪傳單」被捕，供出讀書會名單。他連傳單都沒看過，卻被電擊、拷問，兩個月後被判刑十年。一九五一年移送綠島，一九六〇年出獄。出獄後的蔡焜霖憑著優異的日文、英文造詣，先後在金融《徵信新聞報》、寶石出版社、《東方少年》（後改組為文昌出版社）擔任編輯。後來，進入國華廣告擔任文案撰寫。一九六六年創辦《王子雜誌半月刊》每期發行量高達五萬本。一九六八年蔡焜霖主動協助解決交通及食宿問題，紅葉少棒隊終於獲得全國冠軍，其後又打敗世界冠軍的日本少棒隊，掀起臺灣棒球運動的熱潮，揚名國際。一九六九年《王子》因財務欠佳結束營業，不久蔡焜霖進入國泰機構，先在國泰人壽教育中心服務，後來歷任國泰建業廣告主管、國泰美術館館長、董事長及副董事長秘書、百科文化事業、《儂儂月刊》總編輯等。

一九八七年重返國華廣告擔任總經理，並於副董事長任內退休。